

# 杨开道学术研究综述

马 威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杨开道是近代中国最早关注乡村问题, 并力主“以农立国”的学者之一。杨开道先生的学术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道路紧密相关, 他为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和农村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其学术历程是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和农村社会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 杨开道; 农村社会学; 农村自治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09)02-0039-07

## Review of Yang Kai-dao's Academic Research

MA W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Yang Kai-dao was the earliest scholar who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rural problems and advocated “building nation by agriculture” in modern China. Yang kai-dao's academic resear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al reality of the rural China. He has laid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rural social study of China and rural sociology. Yang Kai-dao's academic life is the microco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social study and the rural sociology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Yang kai-dao; rural sociology; rural self-governing

在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中, 杨开道是近代中国最早关注乡村问题, 并力主“以农立国”的学者之一。杨开道先生的学术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道路紧密相关, 他为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和农村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其学术历程是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和农村社会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杨开道(1899—1981), 号导之, 湖南省新化县人, 1924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农科, 同年赴美留学, 先后在农阿华农工学院和密歇根农业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学, 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 历任大夏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农学院、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兼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之职。1928年, 组织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河镇调查, 1930年在清河镇建立实验区, 同年组织发起成立中国社会学社, 历任理事及副理事长。

长。他于1929—1930年在中央大学农学院乡村管理系担任系主任, 1930年又返回燕大。在燕大, 杨开道先后担任社会学系代理系主任、乡村建设研究所主任、法学院院长等职务<sup>[1]</sup>。

1933年任乡村建设学会理事。1936年发起成立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 同时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合作经济研究社。用杨开道的话概括他自己的学术理念则为: “强调理论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 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的农村, 使专家服务于农民, 农民依靠专家, 达到改良农村组织, 增进农人生活的目的。”<sup>[2]</sup>

总结杨开道的学术成就, 可以概括为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两大部分。学术研究的成果包括: 《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社会研究法》、《农村自治》、《农场组织》、《农村政策》、《农业教育》、《农村问题》、

《农村领袖》、《农村建设》、《农民运动》、《农村调查》。《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和《社会研究法》是他在复旦大学、燕京大学等几所大学授课时所使用的讲义。后面的九本书是世界书局策划出版的一套 14 册的农村生活丛书中的 9 册。

杨开道的重要学术价值还体现在他撰写的一些论文中,包括:《中国农村组织史略》、《乡约制度的研究》、《吕氏乡约的分析》、《梁漱溟先生村治七难解》、《法国的农村自治》、《王荆公保甲新法的研究》、《中国古代的农村自治》、《农村家庭教育》、《农民娱乐问题》等,这些文章见于《社会学刊》、《社会学界》、《农业周报》、《村治》等期刊。

在学科建设方面,杨开道先后参与了燕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大学的农政学科方面的建设,并于 1949 年后,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并主持筹建了华中农学院,即今天的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杨开道将美国的农村社会学学科引进中国,建立了系统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人才培养机制。作为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他亲自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在社会科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费孝通、瞿同祖是其中的佼佼者。

## 一、农村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由于时代的原因,杨开道和那一时代的社会学家一样,将自身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研究是建立在农村社会研究基础之上,而他的农村社会研究的目的则是要“改善农村生活的全部”。

杨开道在《农村自治》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在六年前,民国十二年的夏天,作者还是一位嫡系的农学生,在东南大学洪武棉场实习,对于棉花、玉米、黄豆的交配,还有不少的兴趣,……可是不知不觉的里面,感觉到农业界一个重要的缺点。……(农民)还是在那吃苦,在那发愁,和国内的农学士、国外的农博士,没有一点缘分。当时下了一个决心,不愿意再做和农民不相干的助教、专家、教授,而愿意作农民的朋友,作农民和专家中间的一个介绍人,使专家能够服务农民,农民能够利用专家。”<sup>[3]</sup>

此后,杨开道赴美期间学习西方农村社会和农村社会学方面的知识,并在日后将之带回国内。在“农村生活丛书”系列著作中,杨开道介绍了欧美农村社会学学说,欧美农村发展历史及统计资料,从理论上论述农村社会的性质与特征、种类、起源、进化、

人口、环境、生活、组织等,并结合西方农村社会学原理,针对中国农村社会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和主张。

首先,将农村社区的概念引入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杨开道将“community”译作共同生活,也即社区。他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主要是源自社会学家麦艾维(R. M. Maclver)的研究。他提出,农村不同于一般的“共同社会”,而应称为“地方共同社会”,杨开道将农村社会定义为一种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地方共同社会<sup>[4]</sup>。

其次,以“共同社会”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杨开道开创了系统化的农村社会研究的方法论。他认为农村问题不同于农业问题,农村社会研究不是研究某一单方面的问题,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谋农民全体的幸福,所以应剖析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如人口、地域、心理、文化、经济等。

以系统观看待农村问题,则农村研究涉及范围极为广泛:人口、土地、社会交往、教育、经济、宗教、政治、卫生、娱乐、社会组织等都要囊括在内。农村问题是以人为主体,人与人的关系为主体。土地问题包括土地与人口的比例、土壤状况、土地分配、农场大小等。土地分配仅是诸多问题之一,绝非唯一的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解决之道,在于对农民的教育,包括文化教育、公民教育、农业训练等方面。其他办法有改善交通设施,实行“重农”政策,或由政府出面协助佃农买地<sup>[5]</sup>。

再次,运用系统观,杨开道分析了农村社会生活面临的几大问题。杨开道认为,当时中国农村生活不发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教育不良;第二是经济困难。农民所耕面积太少,耕地不满 10 亩的农家占 1/3 强;第三是工作太忙,农民们拼命工作,把精神生活给抛弃了;第四是农村社会相互间距离太远,交通不便,结果农民只有家庭生活,没有社会生活,也没有充分的人力和财力,去组织社会事业;第五是农民毫无组织。农村是散漫的社会,农民不知组织的利益和方法。

最后,引介西方农村生活运动的经验,谋求改善中国农村生活。杨开道认为,如果按照自然顺序进行中国农村生活的改良,就会耗去许多精力和时间,而如果按照原理和成例的教训去计划中国的农村生活运动,则可以省掉许多精力和时间,成绩也许更好。他介绍了英美等国开展旨在建设“好农业,好经营,好生活”(Better Farming, Better Business, Better Living)的农村生活经验,针对中国农村现状提

出了11项具体意见。包括:提高农民知识;改良农事;注意农村经济;便利交通;扩大农村范围;提倡农民组织;培养农村领袖;发展社会服务;生活社会化;开发正当娱乐;生活艺术化<sup>[4]</sup>。

赴美留学之前,杨开道就“以为农村自治,在整个的农村生活改良是最基本的方法”<sup>[3]</sup>。从事农村社会研究之后,农村自治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对农村自治的研究成为了杨开道一系列农村社会研究的主旋律。

杨开道认为“自治的意义,就是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农村的自治,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村子的人民,大家联络起来,处理他们大家共同的事务。自治的意志,绝对是村民自己的意志,他们自己要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愿意处理自己的事务,才有自治的可能”<sup>[3]</sup>。

杨开道从事农村自治研究之时,一方面,中国政治界正自上而下地推行地方自治;另一方面,各地也陆续施行乡村自治。然而,农村自治施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杨开道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批评。例如自治推行方式方面,“自上而下的政治,无论方法如何良善,组织如何严密,办理如何周到,总是官治,是被治,不能算是自治”<sup>[3]</sup>;以及在自治编制方面,“算术式的编制,机械式的编制只能在纸上奢谈,或是在四四方方井田制度底下实行,对于事实的农村社会,太没有顾到了,……不管他们的家族,不管他们的职业,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不管他们的互相了解,勉强了凑成一块,还能真正去工作,去作自治的基础吗?”<sup>[3]</sup>这种自上而下的推行模式,以及不考虑地方实际情况以编制形式进行组织整合,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农村自治。

面对即存问题,杨开道从“主体”、“组织”、“事业”、“人才”、“经费”几个方面论述农村自治的保障基础,廓清农村自治的本义,旨在为建设真正的农村自治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

杨开道认为,中国农村自治问题在于人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念。“自从秦汉以后,中央集中权力,地方政治,人民丝毫不能过问,所以养成一种不问政治的习俗。人民自己抛弃自己的民权,听凭政府管理的宰割,数千年以来,都是这样”<sup>[3]</sup>。

故而,杨开道还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农村自治的资源,进行了关于农村自治的社会史研究。他广引《周礼》、《管子》、《文献通考》等古籍,论述历朝历代的农村组织。杨开道认为可以把

中国历史上的乡约制度作为地方自治的基础。于是,他进一步探讨乡约制度的起源、演变及其同保甲组织的关系,强调乡约是振作国民精神的一个适当的办法。在他看来,乡约秉承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原则,应该成为全体农民进行自我组织的精神内核。

## 二、农村社会调查与农村社会工作

杨开道认为,“解决农村问题不能单靠理论,就像诊病的医生,必须明白人体的生理和构造,才能判断所患的病症,开出药方。喊几句口号,贴几张标语,就像打吗啡针一样,可以刺激镇定一下,但结果治不了病”,他主张,“为了改良农村社会,一定要先了解农村”<sup>[6]</sup>。

在教学方面,杨开道重视对社会研究方法的培养。他将社会研究方法作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关键。他认为“(培养社会学人才)社会研究方法尤其要紧,并且是其他方面的基础。他是社会学的试金石,有了他,便可以发现事实,发明技术,推求原理;没有他便天天到国外去贩卖舶来的事实、技术和原理。要想社会科学的自主,社会科学的独立,我们一定要先去改良我们的工具——社会研究方法”<sup>[7]</sup>。

杨开道的《社会学研究法》一书根据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授课讲稿整理而成。该书简明地刻划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如1907年的匹兹堡法学做的大规模社会调查、芝加哥学派的帕克(Park)开创的个例研究等。还详细介绍了几种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社会研究方法、历史方法、社会调查法、个例研究法、统计学方法。在书的后半部分则介绍了进行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规范,包括书目的编制、书籍的参考、问题的分解、材料的搜集、材料的整理。

当时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倡导社会学研究中国化,培养方法学习与实践调查的有机结合的社会学人才。杨开道将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们一起深入农村,开展了调查与社会工作结合的清河社会学实践活动。

1928年秋季,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助一笔款项,作为教授社会学及研究社会学之用。杨开道、许仕廉等人决定选择一个村镇,作社会学的教学、研究、服务之用,

即建立一个社会学的“实验室”。许仕廉、杨开道牵头组织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事务。许仕廉任主任,杨开道任书记及实地调查的总指导<sup>[1]</sup>。

调查实践活动历经两年,由许仕廉完成了调查报告,对当时清河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基本状况作了描述和分析,并且着重强调了“清河试验区”在农村社会服务方面所体现出的意义和价值。

燕大社会学系根据清河社会状况调查结果,提出了五条改善当地社区生活的措施:(1)开办成人识字班、图书馆等;(2)重新开办小学,由燕大学生义务授课;(3)开办一个卫生诊所,提高当地的健康水平;(4)帮助农民办销售合作社;(5)当地政府部门应与人民合作,修建道路及排水系统,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河水灌溉,最终将清河建成为本地区的模范镇。

1930年2月,“清河社会试验区”正式成立。在此后的7年内,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展了颇有收效的农村社会服务工作。如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及其他各种合作社;设小本借贷处,试验放款,以改进生产事业,消除高利贷;引进优良品种、凿井、植树等,进行农业改良;开设家庭毛织业训练班;开办幼稚园、幼儿班、母亲会、家政训练班。另外还办了图书馆和阅览室;开展防疫工作和设办医疗门诊等等。

清河试验区所取得的社会实践成果,不仅提高了当地人的生活质量,地方性地实现了杨开道倡导的全面改善农村生活的目标,而且培养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的实践调查与农村工作能力。20世纪30年代,在吴文藻主导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年青学者们运用“功能学派”理论,采取社会学的“参与观察法”,出产了一批实地社区研究成果,可称为“燕京学派”。而“清河调查”可称为“燕京学派”的先声。

### 三、乡约组织的社会史研究

前文提到杨开道为了推动中国建立真正的农村自治,转而进入历史资料寻求农村自治的历史脉络和制度渊源,撰写了《中国乡约制度》、《吕氏乡约的考证》、《王荆公保甲新法的研究》、《中国古代的农村自治》等书籍、文章,探索了一条社会学历史研究的道路。杨开道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其在农村社会研究领域的平实风格大相径庭,显示了精深的史学研究功夫。

《中国乡约制度》是杨开道社会史研究的代表作。杨开道将中国农村组织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是

周以前的传说时期,第二是秦汉以后的混乱时期,第三是北宋熙宁以后的组织时期。通过文献《周礼》,他认为周代的农村组织应该是农村组织的理想模型。周以前的农村组织,据周礼管子各书所载,非常完整,非常严密,不特中国后代不能恢复旧观,就是东西后进业无可比拟。……元魏以后的里制,以及保甲乡约,都是依照古法——周礼里面的法制——所以不是古制复活,便是理想实现<sup>[8]</sup>。

杨开道考引《周礼·地官·大司徒》介绍“六乡”和“六遂”制度之后,评论道:“上面的组织,除了族的四闾构成,凑成百家整数以外,其他阶级都是以五进位,真是十分整齐,十分严密。每一级组织,有一个乡官,主持一切调查,教化军旅的事情,把政治和教育,文章和武事打成一片,完成所谓‘政教合一’、‘文武合一’的理想”。

“秦汉乡治的主要单位自然是乡,乡有三老,嗇夫、游徼等领袖,亭只有亭长,邮只有邮长,里也许连领袖都没有的”。“乡三老是秦汉以后乡治里面的最高领袖”。“三老帮同县令丞尉办理县政。三老不惟下可教化民众,并且上可直达朝廷,把人民的乡治,和政府的乡制打成一片。”杨开道重视在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乡三老制度,认为三老制度适合于中国农村寓治于教的组织形式,并把三老制度的消失看作是乡治混乱的开始。

秦汉至唐宋是一个混乱的时期,农村组织屡次更改,乡治精神根本丧失。一直到了熙宁以后,保甲、乡约、社仓、社学才逐渐推行,乡治精神和事业两方,都有改善的趋势。

在书中,杨开道着重论述了王荆公(安石)的保甲制度以及朱熹与吕氏乡约的关系。他常将王安石的保甲制度与吕氏乡约并论,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为自上而下,吕氏乡约自下而上,正好形成了一个对照。“乡约制度和荆公新法,虽然同是由周礼发源,然而理论上和实际上却是站在绝对相反的立场上,乡约为民众的工作,新法为政府的工作,乡约自下而上,新法自上而下,乡约以一乡为单位,新法以全国为单位——虽然不敢说乡约是受了新法的影响,然而数年之中,产生这样两种绝对不同的制度,也是值得注意的。”

保甲组织最初尉程颢所创,曾经在晋县实行过,成绩颇佳。当时叫做保伍法而不叫作保甲法,“度乡里远近为伍保,使之力益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紫残疾者责之亲戚相当,使无失所;行旅

出于途者,疾病皆有所养”。王荆公大约看见晋城的实例,想起周礼的兵农制度,便订了一种十家为保,五十家为大保,五百家为都保的新法,现在开封附近试行,然后在各路推行。

乡约组织的出现在荆公新法之后,“农村自卫的保甲组织,是在熙宁三年实行,谁知六年以后的熙宁九年,又发现了一个新奇的乡约组织”。

乡约组织颇为简单,每约有约正一人或二人,由大家推举正直不阿的人士充任;他们的责任,在抽象方面是感化约众,在具体方面是主持礼仪赏罚,仿佛是秦汉的三老。除了约正以外,还有直月一人,由全约人士按照年龄大小轮流充任。每月有月会一次,公同聚餐,公举美行恶行,记之于籍,以示劝勉或警戒。

杨开道发现朱熹对乡约组织深感兴趣,朱子不惟亲自增损吕氏乡约,“提倡乡约,并且对于保甲、社仓、小学的工作,也分别提倡,——尤其是对于社仓和小学方面的贡献尤大”。

杨开道对保甲制度和乡约组织抱有浓厚兴趣,撰写此书之后,便下了考证功夫,分别撰写《吕氏乡约的考证》、《王荆公保甲新法的研究》<sup>[9]</sup>两篇长文,考证了两种制度的由来、成文内容、具体实施、制度承继变迁等等。在前文中,杨开道勾沉史料,明辨源流,为吕氏乡约的作者正名、探源吕氏乡约的版本,以及详述朱熹对吕氏乡约的增损始末,是一篇颇见考证功夫的文章。

杨开道曾说:“历史学家的止点,便是社会学家的起点,因为历史家的目的在寻求真实的史料,社会学家的目的便在应用已有的史料去推求前后的因果及至社会的原理”。杨开道翻考历史本义,为施行农村自治寻求民间的历史资源。在这项研究过程中,杨开道表达了他将自治希望寄托于民众,希望中国能复兴乡约传统,建设村民参与、人人共享的自治组织。另一方面,从学理角度,通过历史研究的社会学应用,杨开道将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向更加纵深的视角延伸。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拥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文献资源,中国社会状况需要配合文献研究才能得到更加确切和深入的解读。在《社会学研究法》一书中,杨开道指出了社会学研究要考虑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时间维度即是历史研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后辈学人,如瞿同祖、林耀华皆在中国社会与制度研究中,大量运用历史文献,承继了杨开道的社会学历史研究。如林耀华撰写的《义序的

宗族研究》,虽然采用了功能主义的理论,但是,在文献上,却采用了《书仪》、《朱子家礼》、《礼记正义》、《二程全书》、《傅氏家训》、《陔余丛考》、《礼仪》等大量的历史经典来对汉人宗族制度进行一番梳理考证,体现了“本土社会的必然的诠释方法和外来方法论相整合的积极意义”<sup>[10]</sup>。

作为将西方农村社会学理论引入中国学界的第一代学人,杨开道引入西方的同时就进行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工作,以扎实的研究成果融西方农村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问题之中,应该说是“文化自觉”的学术实践。

#### 四、经世致用的务实之学

生于晚清长于民国时期的学人们,大都怀抱救国图存的意识。与同辈一样,杨开道是为了谋求中国农村发展,谋求中国农民幸福立志而学。所以,杨开道的学术与现实紧密联系,他的思想始终伴随着中国近代农村救亡图兴之路,具有着很强的实用色彩。

20世纪30年代,杨开道发表了多篇政论时评,其中与梁漱溟先生争论的系列文章颇为引人注目。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杨开道较为完整地展示了对于农村建设运动的信心和发展计划。

系列文章题名为《梁漱溟先生村治七难解》,发表于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主办的《农业周报》(Farmers' Weekly)杂志,从1929年10月的创刊号直到第十一号,创刊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六号、第九号、第十号、第十一号,共计七篇。

梁漱溟先生于1929年春天,由广东到江苏、河北和山西去考察农村自治,将所得印象和感想发表在《村治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的《北游所见记略》。“他对于徐公桥、翟城村,平教总会的乡村事业都用了最锐利的观察,下了最切当的评语。”认为几处农村自治的成果并非尽如人意,列出村治七大难题,并“客气地说自己一点不能解答”。杨开道此时正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乡村社会学的课程,并且适逢清河调查,于是杨开道利用教学和实践的积累,针对梁所提出的七大难题,撰写了《梁漱溟先生村治七难解》文章,对应梁漱溟的七大难题一一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对农村自治提出了积极、可行的主张。

梁漱溟先生认为培养和选拔村长是个问题。杨开道认为,村长的培养和选拔一方面需要考虑年龄、阶层、文化素养的问题,同时,比起提出选拔村长的

种种条件,并因为难以找到合乎条件的人选而发愁来说,用长期的训练培养出村民自治合作的领导者,勇于谋划的人才更重要。杨开道认为,“……本来乡村就没有现成的村长资料,村长资料也不是天生的,不想法子去训练而单想弄现成的,事业上那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为甚么教师要训练呢!为甚么医生要训练呢!为甚么统计人才、调查人才要训练呢!……人是万能的,只要有人,不管他新人旧人,消极的人或是积极的人,施以长时间的训练,没有不可以造新的”。

对于村治领导群体出现的新旧人物之争的问题,杨开道认为,“人有新旧、学问无新旧、无论新人、旧人,受了相当的训练,旧的会变新,新的会变得不至于太新,遵守着我们的政策,按照我们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改决农村问题,去增进农人生活,乡下人没有不欢迎的”。杨开道心目中的理想村长应该符合作为现代社会合作的条件,“村长要是一个肯负责任,把公众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拼命地去干……肯负责,想做事,能做事(的人)”。

杨开道还详细地列出了训练村长的计划,包括训练对象、训练内容、学制。杨开道写道:“训练课程除了文字和基本知识添补以外,第一时期便要注意乡村社会的各种基本知识——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统计、教育学等。第二时期便要注意到自治的原理、自治的法规、自治的历史,以及各国自治状况。最后的时期,便要注意到自治的实施——户口如何编查、公安如何保卫、教育如何提倡、农业如何改进、卫生如何讲求、道路如何修筑、娱乐如何欣赏、灾害如何防治。所包含的内容,一句句都是实话,都有根据,都可依靠。……课堂训练以外,平时应该有充分的实习,教学生了解实际的问题,毕业以后或是三年讲授完毕以后,应该有半年以至一年的长期实习,整个实习,去启发他的应付的才能,积蓄他的办事的经验。”

其中,杨开道展示了他关于农村人才培养的教育思想,并在其日后进行的农村人才培养教育实践中得到发扬。

杨开道反对在村长的任用态度上抱有暂时和应急性的态度。他希望通过村长人才的专门培养,能给农村自治长期输送富于农村工作经验,扎根于农村的领导者。

另如,在关于对梁漱溟所提村民问题的回应中,杨开道提出了废除农村手工业的思想。他谈到“(将

农村建设为自治的公民社会)手工业的废除是一个先决条件,一天到晚十几个小时都在那里运用肌肉,结果还不足一饱。那里有余钱去购买读物、开办学校;那里有余闲去研究学问,运用脑子呢!机械农业第一可以节省时间,第二可以宽裕经济,第三可以运用脑子,有了这三样基本,然后扶植其自治能力,训练其自治习惯,便成为自治的公民”。

杨开道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就已经形成了关于农业机械化的成熟看法,并清醒地认识到农村脱离手工劳动的未来出路,打破了一些使农村返朴归真,重回传统的农村建设者的迷梦。

再如,杨开道对于施行在农村自治中的四级制度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不自然”,“本来农村社会有三个自然的区域,我们不去利用,而偏要创出一种四级制度出来”。他认为“村的区域采取自然的农村地方社会 community,村的下面采用邻里区域 Neighborhood Area 作为基本单位,村的上面采用乡镇共同社会 urban community,作为村县的中间阶级,便可以互相团结,共同工作。”

当时活跃在学术界的一批农村建设研究者和实践者,关注农村自治中的制度和规模等问题者寥寥,“自治区域的大小、形式、关系,尤其无人过问。因为社会区域的研究,是最近十五年才开始工作,所以还没有十分普遍”。但是区域的规模、大小、形式、关系等问题,却对农村建设实际内容的开展关系极为切重,制度设计恰当与否会决定性地影响政策实施的好坏。杨开道将国外区域社会学研究的前沿思路引入中国,并很好地与农村社会相结合,提出了具有相当高水准的意见。

杨开道从可操作层面探讨了农村自治面临的七个紧要问题。并综论“村民、组织、经济、事业、人才、经费、编制、区域”这七方面问题的解决步骤是:“一方面提倡农村大众能组织起来,在运输上,交易上,金融上,互相扶助,增加他们经济的利益。等到生计问题稍为松动以后,我们便马上去办理各种教育的事业。这三件东西:自治、经济、教育,是农村社会的骨架,是农村生活的基本,有了相当的办法,才能进一步办理卫生、宗教、娱乐、社交的事务……。”与梁漱溟的悲观相比,杨开道展现了他的积极乐观态度,这积极态度并非空穴来风,恰恰由于建立在长期务实的基础上,杨开道才可能真正提出建农兴农的可行性意见。

无疑,出于实践的真知不会过时,即使在今天看

来,杨开道的这些建设思路依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值得新时期农村建设的学者们深思。

继该文发表之后,杨开道又发表大量文章,从不同侧面探讨农村建设的实践道路。如《农业周刊》第十四号始发表《农村娱乐问题》(连载)、第十六号始发表《农民教育问题》(连载)、第十八号始发表《农民家庭教育》(连载)等等。杨开道这一类文章与他为世界书局策划一套农村生活丛书的撰写紧密相关,都是用通俗平实的文笔探讨农村建设的具体问题。一方面这些文章让关心农村建设的知识分子真正了解了农村、认识了农村;另一方面也为政府发展农村建设提供了实践性参考。这类文章都从一个角度深入,探讨农村建设的一个侧面,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带有着很强的实践指导价值。例如,杨开道提到农村娱乐问题时,强调农村娱乐的重要价值,可以放松身心,锻炼身体,同时可以提高农民的组织性,增加农村的社区凝聚力。在发展娱乐的内容上,他提出可以以村小学为核心,发展体育、文娱等活动,并寓教于乐,一举多得。

## 五、结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忧外患,中国农村经济萧条,灾荒连年,农村社会混乱,民不聊生。为救国于即堕,农学成为强固国运之本的重要手段,农学也成为了一时之显学。1896年,上海务农会成立,开近代兴农风气之先。罗振玉为创办者之一。1896年,浙江杭州知府林迪臣在杭州筹办中国近代第一所农业学校——杭州蚕学馆。至宣统元年,全国有初高等农业院校100余所。杨开道成为了中国早期现代农学专业的一名学生,并在此后成长为中国首位农村社会学专家。20世纪20、30年代,杨开道将其生平所学奉献给中国农村建设,为探索中国农村建设的出路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书籍,他体现了传统中国学者文以载道的使命感,将学术与现实紧密联系。

作为中国第一位农村社会学博士,杨开道严格地依据学科规范撰写农村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书籍,为培养农村社会学专业人才准备优秀教材。作为最早关注农村社会的社会学专家,杨开道系统地将英、美、丹麦、法等西方国家农村改革和建设经验介绍到中国,为探索农村发展之路的学者们开阔了视野,提供了参考思路。同时,他亲自将西方实践与中国现实结合,其撰写的书籍涉及到农村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内容细致扎实,现在读来也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20世纪40年代,杨开道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期间,撰写了大量引介西方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探讨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文章)。作为最早怀抱农村自治理想出国求学的学者,杨开道却在发历史之微,撰写制度考证之文,细致发掘中国历史自治传统的脉络,开创社会学与历史结合研究道路的先河。杨开道的学术应了时代的召唤,并成为了时代的强音,而其学术音律,仍然具有强烈的魅力,值得我们重新奏响。

## 参 考 文 献

- [1] 阎明. 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 [2] 罗东山.“杨开道”.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 [3] 杨开道. 农村自治[M]. 上海:世界书局,1930.
- [4] 杨开道. 农村社会学[M]. 上海:世界书局,1929.
- [5] 杨开道. 农村问题[M]. 上海:世界书局,1930.
- [6] 杨开道. 农村社会[M]. 上海:世界书局,1930.
- [7] 杨开道. 社会学研究法[M]. 上海:世界书局,1929.
- [8] 杨开道. 中国乡约制度[M]. 邹平: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1937.
- [9] 杨开道. 王荆公保甲新法的研究[J]. 农业周报,1930(29):3.
- [10] 庄孔韶. 林耀华早期学术作品之思路转换·义序的宗族研究[M]. 北京:三联书店,2000.

(责任编辑:陈万红)